

论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中的四大关系

余绪纓

(厦门大学 会计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知识经济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而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因为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机制有利于调动人的进取和创造精神。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从边缘化向中心化转变。要培养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必须深化教育改革。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的狭义观和广义观;人文素质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5-0040-06

众所周知,知识经济是近年来中外学术界正在展开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那么,什么是知识经济呢?我的理解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地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识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经济,自然就可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1]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地理解的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层面,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2]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我感到对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中的以下四个关系,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阐发,并使这四个方面得以相互贯通,以期对知识经济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更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一、知识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

收稿日期:2002-05-23

作者简介:余绪纓(1922-),男,江西靖安人,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无法融入当代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使我国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难于实现,进而危及子孙万代!

为什么说,知识经济不可能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形成和发展呢?这是因为:

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的“大统一”的经济体制,企业只是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而是由国家直接对全国经济实行纵向的集权化管理。

经济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使社会成员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要求每个社会成员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自由地发挥。试想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具有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善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2]

二、知识经济中“知识”涵义的狭义理解与广义理解的关系

知识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其主导产业,因而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研讨知识经济有关问题时往往强调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似乎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没有多大的关系。这种长期形成、已趋于根深蒂固的“重理轻文”的思想倾向,我认为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有害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拙作《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培养》一文[1]中已作了初步的论述,现以该文的论述为基础,作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

首先,从理论上讲,自然科学技术要解决的问题,是辨别真假,因而它是求真的知识体系(认知体系);而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认知体系),而且同时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它不仅包含了区分真假,还包含了区分善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善对真具有导向作用。自然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它主要提供工具理性,解决不了伦理规范、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其成果既可用于造福于人类,也可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作为20世纪伟大发现之一的核能就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则不然,它研究的对象是人文世界,它为人类提供价值理性,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

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些人并不这样看。由于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于是有人提出,在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

记·货殖列传》)的世界,鼓励人们去读唐诗、宋词、《红楼梦》等长期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高度评价的优秀文学名著,借以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究竟有什么用处?诚然,从世俗观点、工具性标准看,它不能解决吃好、穿好等现实的物质性问题,是没有直接的功利性用途。但从价值理性看,却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以致达到伟大诗人杜甫在《望岳》一诗中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周易·贲卦第二十二》)的背景越宽,视野也就越广,融汇贯通的能力也会越强,对于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就越能站得高、看得远,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会越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例如:我国东汉时代的张衡,既是大科学家,也是大文学家。他创制了精巧的研究地震的地动仪和研究天象的水力驱动的浑天仪,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是那个历史时代整个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可与此相媲美,他撰写的《东京赋》、《西京赋》等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作为本世纪取得最辉煌成就的科学家之一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精通音乐。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由数学公式组成。”^{[3](P45)}“物理学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总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它可以概括世界的一切。”^{[4](P58)}爱因斯坦创立的划时代的相对论,就是从想象开始的。可见重大的创造、发明离不开想象,而提高想象力,又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的修养。

无独有偶,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也擅长音乐,并在我国学术界大力倡导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和新学科的原创性研究,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大师风范,伟业长存。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有艺术,因为科学中有美学。”^{[4](P46)}言简意赅,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仅举此数例,已足以说明:古往今来,许多科学大师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其实都是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成就。我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是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所作的阐述。

再从实践上看,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科技成果如果不投入生产,不走向市场,充其量只是潜在的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只有从展品、样品转化为工厂生产的产品、商店出售的商品,在社会上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被认为是现实的生产力。而要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化,相应的社会机制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为促进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地迅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行为科学等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示出来了。它说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可见在实践中任何厚此而薄彼的倾向,都是极其错误的。

三、知识与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关系

1. 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从边缘化向中心化转变。

首先,知识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经济,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的知识作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载体,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在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谁掌握的知识越先进、水平越高、创造力越强,如果组织发挥得好,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就相应地越大。这种客观现实,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来,就会使知识经济社会的人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传统的“官本位”制,转而确立人才本位、知识本位、能力本位制,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以极大地提高;进而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对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停留于只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应如实地把他们视为工人阶级中进行价值创造的特殊部分和主导部分,是关系国家盛衰成败的关键部分,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从边缘化向中心化转变,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必然。

其次,从技术层面看,如所周知,知识经济社会同时是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网络化,可破除社会统治者对信息的垄断地位,即从信息技术上破除历史上纵向的等级机构,形成网络式的横向自主的连接结构,这也有助于从信息技术上有力支持知识分子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这种情况也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如所周知,历史上的统治者多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季氏》)的愚民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没知情权,这就为各级统治者为维护、巩固其政治上的等级制和特权制增添了无比的威势;并把信息垄断既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作为巩固既得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信息都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任何人想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信息的全面垄断也就不可能像历史上那样灵验了,这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怎样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处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同时又是处于从发展中的工业经济逐步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时期。加速实现这两个转变,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但在这个过渡期,由于我国长期封建历史的影响,“官本位”泛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这对于加速实现以上两个过渡还起着相当严重的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独立性、自信心很强的人。这些人本来都是对于加速实现以上两个过渡可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为社会上一些有用人权力的单位所不容,使他们无法各展所长,为国效力。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彻底改变,否则,将使我国的以上两个过渡难于尽快地实现。

怎样改?我认为首先要从源头做起,把立人作为立国之本,把人的现代化作为一切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立人就是立现代化的人,较具体地说,就是立有觉悟的,能自尊、自强、自律,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人,既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也能积极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而决不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可能出现的热衷于搞人身依附,只会对上级阿谀奉承、唯唯喏喏的人。只有在全社会树立了正确的人才观,才能使天下英才都有用

武之地,使各项事业呈现一片兴旺发展的景象。同时,也只有由这样的现代化的人组成的国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国家。

其次,要提倡学术无禁区,树立学术上独立自主的意识,开展非功利性研究。

从根本上说,学术研究的功利性与独创性是相矛盾的。因为功利性研究,往往表现为:只能局限在一些人设定的框框中进行,甚至要求研究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某些人的意图进行曲意式的所谓论证,而不是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的所谓研究,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今后如果能壮大“非功利性”的研究队伍,让他们以超然独立的态度,开展非功利性的研究,就能为实现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有利条件,因为“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看来这是具体发扬学术上独立自主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也只有这样,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真正形成,这对加速我国实现上述两个过渡的进程将大有好处。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应怎样理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似乎没有什么可谈了。其实不然。

尊重知识,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前人和今人创造的文明成果,并对这些文明成果在继承的基础加以发展,这当然是对的;至于尊重人才,是把尊重人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尊重才放在第一位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因为如果不是把尊重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尊重才放在第一位,就意味着实际上是把人当作工具,把才当作目的,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如果某些人认为某某人确实有才,但他的才对我无用,甚至有害,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值得尊重了,甚至还有可能由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样,就完全违背了尊重人才的本意了。所以我认为,所谓尊重人才,应把尊重人作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只有真心诚意尊重人,使被尊重的人受到激励,无才可以变成有才,小才可以变成大才。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把尊重人而是把尊重才作为根本的出发点,那只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就根本达不到“尊重人才”的目的。

四、知识经济与深化教育改革的关系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面向知识经济,教育所培养的应是知识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知识经济社会所需要人才,其核心是具有创造性思维(包括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强调:

1. 实行个性化教育,废除过去标准化的教育。因为过去标准化教育可能导致人的机械化、非人性化,扼杀人的个性的发展。这样的精神状态的人,还能谈什么革新创造?

2. 发扬教学民主,鼓励学生存疑,鼓励学生寻根究底,发挥自由思想,不唯信权威,不迷信已有的定论。要大家充分认识到:教学生做学问就是要教学生怎样善于发现问题、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与新途径,使整个教学过程充满生机与活力。

3. 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教学相长的关系,恰当地发挥教师在教学中应有的作用。

在形成了个性化的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中,还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是不妥当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只是对教师素质

上的要求更高了。素质上的更高要求,表现为古人所说的“学有本源者经师也,言(包括著作)行可模可范者,人师也。”说明人师高于经师。唐代大学者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赋予新的内涵,并未过时。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非常先进、非常发达,学生对已有的知识大多可以从电子教育(电脑网络)中学到,教师在“授业”(传授已有的知识)方面的任务是可以大大减轻了,但学生在教学中不通过同教师进行高素质的学术思想上的交流,居于核心地位的创造性思维却很难自然而然地形成。因而在“传道”方面许多方向性问题(包括做人学与做学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教师进行启发和引导;在“解惑”方面,在指点迷津,使学生少走弯路方面也需要教师进行启发和引导。古人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道理的。

4. 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学生应具有“博”(文理会通、中外融汇)、“专”(学有专攻)、“精”(历经磨练,而具有突出的别人无法企及的长处)的知识结构,并以“新”贯穿于知识结构的各个方面。

以上是从总体上说的,以下根据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的特点再谈一点意见。

博士学位是学位的最高层次。从总体上看,博士生通过严格的入学筛选,已具有较广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与较强的专业能力,并各有所长。据此,博士生的培养,应采取更特殊的英才教育形式,即适应他们已有高素质的特征,应以独立性、研究性的教学方式为主,可考虑采用类似于中国古代书院式的教学方式。其要点是由导师或导师指定的人员(其中也可以包括博士生本身)定期主持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每个成员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大家围绕研讨的主题,自由地进行各种理论观点的交流或交锋,既可互相吸收、借鉴各种不同的观点,也可能在热烈的思想交锋的气氛中迸发出新的思想的火花,激发出新的灵感,进而取得新的开拓性成果。如此反复进行,不断登上新的台阶,最后形成新的学派,在学术上卓然有成,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参考文献:

- [1] 余绪纁. 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J]. 中国经济问题, 1998, (4).
- [2] 余绪纁. 论知识经济的社会文化观与现代管理会计[J]. 财会月刊, 1999, (9).
- [3] 编委会.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1卷[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 [4] 编委会.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3卷[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沈小波]

Four Relation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YU Xu-ying

Abstract: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cannot develop in the context of planned economy, instead, it takes market economy as its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at equal value and the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in market economy are conducive to human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creativity. The word "knowledge" in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encompasses knowledg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knowled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is contributive to improv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our educational reform in order to produce graduates with high creativity needed in the age of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Key words: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knowledge in a broad and narrow sense, humanistic quality